

改革论坛

生态与产业要融合发展、美美与共

【核心提示】乡村振兴关键是激活农村在工业化时代未被定价而长期沉淀的生态资源,而这恰恰也是生态治理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我国发展实际而言,随着“两山”理念、生态扶持政策、数字乡村战略等的实施,我国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道路逐渐向技术化、市场化转变。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具有良好基础。

□薛永基

2021年4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成为我国首个将“两山”理念落实到制度安排和实践操作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可见,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是目前国家同时推进的两大战略安排,构成县域治理的两大主题。生态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就我国发展实际而言,随着“两山”理念、生态扶持政策、数字乡村战略等的实施,我国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道路逐渐向技术化、市场化转变。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具有良好基础。

乡村振兴关键是激活农村在工业化时代未被定价而长期沉淀

的生态资源,而这恰恰也是生态治理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只有深入贯彻落实“两山”理念,促进城乡生态要素的高效保护和有序流动,将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才能最终实现。生态治理为产业发展营造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决定着乡村产业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没有美丽的乡村,没有强大的农业,就没有富裕的农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前提保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人们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变革,也提高了自身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能力。

因此,为实现农业经济提升、推动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在重视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要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大力推进乡村产业,生态治理必然相伴而生。换言之,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生态治理作为支撑。产业发展一方面为生态治理提供了较为基础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引发了生态产品新的需求。在县域要靠产业生态化打开绿色发展之门。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产业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应当培育节能型、环保型、清洁型产业,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和谐并进。同时,产业结构的改变也会给环境带来改变。技术进步

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改善;清洁技术的开发和对传统技术的取代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加之产业结构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向以知识和技术为特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产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会逐步减轻。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在县域治理中必须坚持贯彻落实“两山”理念,坚持将产业发展绿色化、将生态保护产业化。构建资源利用合理、生态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使“生态治理的绿水青山”转变成“产业发展的金山银山”。究其本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实施过程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及实

现过程密不可分,该过程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产业发展、农业农村、绿色金融等多个领域,要取得突破性的机制改革创新成果,需要多个学科及专业领域的人才智力支持,也需要宏观层面的调控和支撑。没有生态资源,工业发展就是无源之水。生态保护的长久治理离不开产业发展的物质支撑,产业发展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协同要围绕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广泛地开展协作,促使系统中各种要素有机结合,最终使系统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跃升,实现融合发展、美美与共。(摘编自《人民论坛网》)

观察与思考 各抒己见

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郑岩

山里野生菌卖得俏,海里水产品养得好,田里稻与虾产出丰……近年来,各地跳出“一亩三分地”的单一种植,唱“林草戏”、念“山海经”、打“科技牌”,让更多自然资源产出多样美味,助力食物供给更多元,居民餐桌更精彩。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我国以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如何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国民营养健康水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就是要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中国合理膳食行动,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群众

获得更多营养产品。更好树立大食物观,才能满足人民群众饮食需求,守护“舌尖上的幸福”。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三农”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树立大食物观,正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同时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有助于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牢牢端稳“中国饭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人们的食物结构正在发生改变,食品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指出:“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缺了哪样也不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主食吃得少了,肉蛋奶消费量上去了;有机粗粮、特产水果、山珍海味等日益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树立大食物观,丰富粮仓、菜篮、油瓶和果盘,才能优化食品供给结构布局,让人们吃得更好。时下,挪威三文鱼、泰国榴莲、西班牙火腿等外国美食,装点着中国人的餐桌。树立大食物观,既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更要立足自身,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农业生产多样化提供了条件。让食物来源更广泛、食物种类更丰富,就要将目光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更好开发食物,逐步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树立大食物观,必须向科技要答案。时下,一个个食品新领域成为研究新课题。如何发展现代种业、栽培技术,让产出食物更优质;如何读懂山水林田湖草沙,让更多食品种类形成生态产业;如何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实现食物品种生产方式创新;如何加强生产和市场的联系,形成稳定产业链……回答相关问题,需要多学科合作攻关,群策群力,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过去几十年,杂交水稻让亿万中国人“吃得饱”,让“禾下乘凉梦”逐渐成为现实。相信不久的将来,来自山林大川、江河湖海的多样食物,将让14亿多中国人“吃得好”“吃得健康”,推动国民科学合理膳食,为健康中国筑牢根基。(摘编自《人民网》)

文化兴村需要点“憨劲”

□刘知宜

“文化憨人”,山西省黎城县霞庄村委员会主任李建华这样描述自己。他用十年时间抽丝剥茧地挖掘霞庄历史文化,将霞庄打造成历史文化名村,闯出了一条“红色”与“古色”交汇的“文化兴村”之路。今天我们守护传承乡村文化,恰恰需要李建华这样的“憨劲”。乡村文化自信建立需要“憨”。村庄是时间炼成的聚落,从不缺少丰厚的历史文化根系与当代精神价值,缺少的是深潜其中的挖掘者与因地制宜的开发方式。许多村庄与过去的霞庄村一样,对本地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缺乏自信与认识,村民“守着聚宝盆过穷日子”。而要科学全面地将乡村历史文化整理、呈现出来,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需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憨人”姿态沉心坚守、苦心耕耘,帮助乡村逐步“找回”文化价值,找到发展方向。乡村文化活力焕发需要“憨”。文化振兴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李建华对霞庄村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整理,仅仅是霞庄村发展的准备工作,面对乡村的整体发展,要实现“文化兴村”,还要解决资金不足、渠道不畅、基础设施建设不够以及村民不理解等多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始终葆有为乡村谋发展的初心热情,以无私奉献的使命感守护弘扬乡村文化,才能有所成就。这股“憨劲”,是乡村文化工作者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乡村需要更多这样的“文化憨人”,“憨”之一字,内化为执着,外化为坚守,既带有研究者的色彩,也描述了奉献者的姿态。“文化憨人”能够为乡村带来的,不仅是一块留给乡愁的精神栖息地,还有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希望。(摘编自《农民日报》)

废猪圈变艺术馆,农民需要更多“精神粮食”

□墨攻

“回到家乡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日前,央视新闻播出了王旭潭的故事: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成了一名建筑师。十多年后,在外工作的他回到老家湖南娄底双峰,将家中荒废的猪圈改造成艺术馆。这座艺术馆里,会展出方言系列的书法、画作、陶瓷……他说每个走出村子的年轻人都有回馈家乡的方式,他希望通过做展览“播一颗种子”,唤醒村里孩子对外界的好奇。猪圈从喧嚣到渐归沉寂,从被废弃到变身艺术馆,这种“小变化”里,其实藏着时代的“大变迁”。据王旭潭回忆,小时候家里养了三四百头猪,一到下午4点放学回家就得帮手干活,汗水混着猪的粪水浸满全身,满是“辛苦的味道”。如今,家里的猪圈被废弃,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家里长辈老去、体力不复盛年,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养猪产业在进化:因环保经济等因素驱动的规模化、工业化,家庭作坊式的猪圈自然盛景不再。比如,前不久湖北一栋26层的养猪大楼出圈,一套专业化系统就花掉了2000万元,年出栏量预计可达60万头。而除了产业变化,农村的“老去”与“瘦了”也是这种变迁里的常见图景。不少农村人洗脚进城,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奔向远方,“人户分离”现象大量存在,留在农村里的大多是以老人为主体的“386199部队”,几乎每一个农村出身的人,都被卷进了“乡土中国”向“离土中国”转变的洪流中。说起来,你很难把这种变化简单地概括为“好”或者“坏”,但有些逐渐淡去的东西,确实让人感到遗憾。比如随着年长一辈逐渐走向生命的终点,方言以及背后独特的乡土文化的流逝让人唏嘘与感喟。

诚如媒体分析的那样:如今的中国乡村,物质生活改善肉眼可见,精神生活提质悄然而至,从“讲生产”到“重生活”,中国乡村愈加注重精神生活。从文明的角度看,打上浓浓农耕印记的农村文明,其实是一种“静”的文明,农业系于土地的特性,让农人获得了一种定力,人变得安土重迁、讨厌迁徙。但我们的祖先毕竟经历过“动”的文明阶段,采摘、游牧、狩猎是祖先安身立命的技能,年轻人渴望走出去,其实是镌刻在骨子里动的DNA在召唤。于是,在这种人口不断的“走出去”与“归来”的流动里,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发展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见过了外面世界、在建筑领域具备专业素养的王旭潭回到家乡,为村民乡邻“观世界”提供了一种供给的可能,而这正好可以契合村民向往外部世界,希望扩大认知边界的精神需求;对老

年人而言,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小孩来说,则可能是打开未知世界的一次启蒙。最为关键的是,在供需之间,王旭潭找到了方言这个近乎完美的连接密码。比如“猪大三百斤,鱼大没得称”为例,初看只是觉得这体现了农耕文明的智慧,但他从事海洋工作的叔叔告诉他,原来海里最大的鱼有十万多斤。观过世界后,再把这种认识讲出来,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领悟。作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故乡,娄底双峰一直有耕读传家的传统,用王旭潭的话来说,在老家那里“钱挣得多的,不会成为大家的榜样。谁读书多,谁的知识多,才会成为榜样”,这种理念其实也是农村农人对精神粮食渴望渴求的一种呈现和表达。更进一步来看,这未尝不是众多农村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的“共同画像”。(摘编自《南方农村报》)